



调查
动机

“要么彻底不让孩子用平板电脑,要么只能被迫放弃了用。”近日,来自浙江省宁波市的张先生来电反映自己的苦恼——自家孩子上初二了,最近经常和家人为用不用未成年人模式而争吵,“他不想用,说未成年人模式下没有自己想看的内容;我们要求必须用,不用的话,网上的不良内容太多了,很容易被孩子看到”。

前几天,张先生发现孩子使用成人身份信息解除未成年人模式绕开监管使用平板电脑,追问得知是同学介绍网上买的成人身份信息。

“寒假马上就到了,我们白天上班也不可能老盯着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张先生说,真心希望有关部门或平台可以推出适合初中生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模式。

如何让未成年人模式更好地发挥作用?对此记者展开了调查。

启动未成年人模式,孩子找不到爱看的内容

专家:给予未成年人内容创作者流量支持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未成年人模式我坚决不想用,比如我喜欢看××短视频,未成年人模式下,里面尽是很幼稚的视频,估计小学生甚至是幼儿园小朋友才会喜欢看。”来自浙江宁波的初二学生小张对《法治日报》记者说,“我已经上初中了,很多App打开未成年人模式后,里面的内容根本无法让我提起兴趣。”

小张的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很多未成年人上网时都不愿意使用未成年人模式,不少家长为此忧心忡忡,也引发了不少争执。还有一些未成年人用户会通过各种手段绕开监管,使未成年人模式形同虚设。

受访专家指出,未成年人模式的普及需监管部门、平台、家庭和学校四方协同发力。平台应当承担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责任,为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打造适宜的专属内容池,并给予创作者流量支持;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推动未成年人模式有效普及,更好地服务青少年成长。

内容低幼 功能简配

近年来,互联网逐渐融入青少年的生活,为了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未成年人模式孕育而生,旨在为青少年营造健康、适宜的网络环境。限制使用时长、筛选内容等功能成为其核心亮点。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不仅很多孩子不认同,不喜欢未成年人模式下的内容,不少受访家长也表示,未成年人模式下,平台提供的功能,内容都太少了。

来自天津的初中生小孙在手机上熟练地打开某短视频App,进入未成年人模式,“你看,里面都是些儿歌、低龄动画以及基础的识字算术课程等,这些动画片我小时候就看过;里面根本没有我感兴趣的动画片和科技知识、文化历史等内容的讲解”,她对记者说,“启用未成年人模式后,搜索功能没了,只能推荐什么看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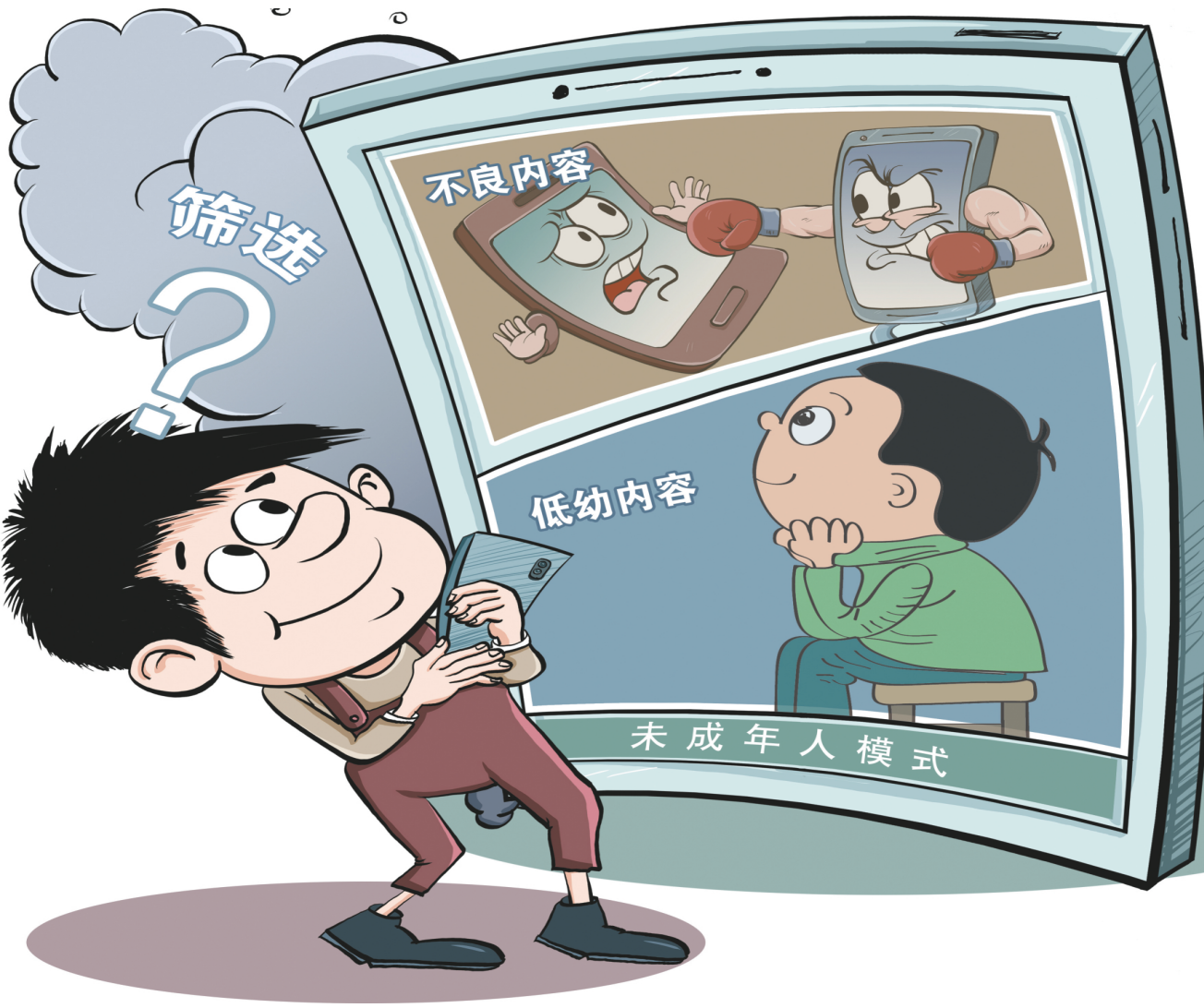
“我家孩子上小学高年级了,阅读能力已经有了一定提升,但在未成年人模式里根本找不到适合他年龄段的经典文学作品或者科普读物,不仅孩子觉得,我作为家长都觉得里面的作品太幼稚了,不愿意使用这个模式。”河北学生家长刘先生无奈地说道,他打开一款知名的在线阅读App,在未成年人模式下,里面的书籍大多是简单的童话故事和低价绘本。

受访专家认为,大量低幼内容使得许多青少年很快便对未成年人模式失去了兴趣,转而寻求其他方式浏览网络信息,导致未成年人模式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也使得青少年难以在网络中获取与他们年龄和认知水平相匹配的知识,阻碍了他们视野的拓展和思维的提升。

来自山东的家长李女士说,有些App开启未成年人模式后功能“缩水”,无法查看之前为孩子关注的信息和收藏的内容,而且推荐的视频内容良莠不齐,孩子不愿意用。

还有受访家长提出,虽然一些平台在未成年人模式上下了一定功夫,对内容筛选作出了改进,提供教育知识、文化艺术、科技创新等适合青少年的优质信息,但不分年龄段,6岁和16岁看的都是同一版本,加上没有弹幕、分享、投稿等功能,也很难吸引未成年人使用。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



主任朱巍认为,根据相关规定,未成年人模式应该分级分类。例如未成年人年龄达到7周岁时,推荐内容就应该含有通识教育。但是由于内容分级需要算法跟进还有推荐内容时效性等问题,完全做到需要花费大量成本,因此大多数平台因为成本等问题而未按照规定实施。

漏洞百出 绕开监管

“孩子用××搜索App搜动画电影,结果排在前面的链接点进去却是黄色网站。”来自天津的家长王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孩子经常使用一款搜索App搜资料,App首页时常推送一些涉暴力、擦边等不良视频内容,有一次竟然搜到了黄色网站,他立即想给该App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但怎么找也没找到这一模式。

除此之外,多位受访家长反映,在使用一些App的未成年人模式过程中发现不少问题,有的开启了该模式,平台推送的内容中仍然有不适宜未成年人的内容,比如暴力、擦边等;有的App可以随意切换成人模式和未成年人模式,而不需要进行身份验证。

根据受访家长指引,记者测试了某款社交App,在开启未成年人模式后,使用者可以一键切换账号,而切换后的账号认证信息如果是成年人,则不再自动开启未成年人模式。

据公开报道,不久前,江苏的张女士发现,她9岁的孩子沉迷于手机游戏,每天大量时间都花在了各种游戏上,导致学习成绩急剧下降。张女士查看手机发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孩子租用网络游戏账号花费竟有2000余元。

防沉迷规定要求,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

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网络游戏服务,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为何自己的孩子却没有受到限制?经追问,张女士得知,孩子租了一些游戏账号,这样他就能规避防沉迷系统限制,想玩多长时间就玩多长时间。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有一些未成年人在网上购买成人账号,以此绕开未成年人模式。“在网上可以轻易购买到成年人信息认证的账号。即便有些App已经进一步升级,但是还有许多App可以通过重新下载、断网、换账号等操作来破解未成年人模式。”来自山东的初中生小钱告诉记者。

就未成年人模式出现的问题,上海诚康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大成律师认为,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模式不具有强制性,系由用户自主选择适用,很多App的未成年人模式仅需简单的认证即可破解;另一方面未成年人模式下,一些App缺乏趣味性,没有建立青少年专属内容版块,而仅仅对App的部分内容进行简单删减,导致很多青少年不愿用未成年人模式,想方设法绕过监管。

优化内容 强制推行

受访家长普遍表示希望能够优化改进未成年人模式。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提到,移动智能终端应当为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用户提供差异化的使用时长管理服务。在未成年人模式下,应用程序提供者应当为未成年人打造专属内容池,方便未成年人获取丰富、健康、有益的信息内容。根据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能力,推荐适龄优

质内容。

目前,已有短视频平台积极响应,针对14岁以下实名认证用户,采取强制进入未成年人模式且禁止自行退出的机制。在视频内容方面,未成年人模式可以选择不同年龄,从而根据不同年龄的接受程度推送不同的视频内容。且该平台保留了搜索功能,使用者可以有目的地在未成年人模式提供的图片、视频里寻找自己需要的内容。

在张大成看来,要想更加完善和更有效地推广未成年人模式,在技术方面,应进一步推行人脸识别验证功能,确保只有家长(监护人)可以更或退出未成年人模式。

“未成年人模式的普及需多方协同发力。建议政府将未成年人模式作为法律强制义务,强制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产品运营商提供该模式,并加强监管,确保有效运行。学校和家长应引导培养青少年正确的网络使用习惯,督促青少年正确使用未成年人模式。”张大成说。

在内容方面,朱巍认为,现在适合儿童看的内容较少并非内容审查制度的严格,而是现在专门制作未成年人内容的人和公司比较少,创作出来的优质内容更少,导致很多视频、图片等内容可能符合未成年人模式要求,但不符合青少年的心理需求。

“目前的流量池往往偏向于能否兑现、赚钱,而忽略了对未成年人内容的供给。这种情况下,即使平台进行分类,也没有足够的内容供给而导致无法有效推广未成年人模式。”朱巍提议,平台应该给予未成年人内容创作者流量支持,让内容创作者受到实质性帮助,生产出更多孩子愿意看的优质作品。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陈磊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桂林市委书记周家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4年12月28日10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称。

随着2024年日历画上休止符,周家斌被定格为2024年落马的最后一“虎”。整个2024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总计通报执纪审查58名中管干部。

《法治日报》记者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信息统计,全年还执纪审查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200多名,执纪审查省管干部600多名。

受访专家认为,2024年查处的“大老虎”数据令人震撼,一方面说明党中央依然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不放松,反腐败斗争必须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始终利剑高悬;另一方面也说明反腐败清存量、遏增量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需在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用力。

体现重点整治领域成果

周家斌从晋升副部级到此次被查,不到两年时间。根据公开资料,他是山东鄆城人,被查处时刚满60周岁,教授级高级建筑师、高级城市规划师。

周家斌早年曾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秘书长等职务,2008年7月到广西工作,担任过南宁市副市长、北海市市长等职务。2015年2月,他获任桂林市委副书记、市长,2017年转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2021年2月,他回到桂林工作,履新市委书记。

2023年1月,周家斌当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晋升副部级,继续兼任桂林市委书记一职。

而2024年首个被查的中管干部是钟自然——自然资源部原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时间是当年首个工作日。

钟自然是一名“60后”,安徽桐城人,曾担任过原国土资源部地质调查司司长、总工程师等职务。2014年7月,钟自然出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党组书记,同时任原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

2018年自然资源部成立后,钟自然出任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党组书记,2022年9月卸任。

被查半年后,2024年6月21日,钟自然被开除党籍。从钟自然到周家斌,2024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总计通报执纪审查58名中管干部,其中包括9名正部级领导干部。此外,2024年还有59名中管干部被通报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北京廉政政治协同创新基地主任彭新林认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而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上述数据显示,一方面,党中央一直在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自我革命始终利剑高悬,反腐败高压态势不变,反腐败效能提升;另一方面,反腐败清存量、遏增量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需在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用力。

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看来,58名中管干部被查,数据令人震撼,传递出强烈信号,即党中央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不放松,反腐败工作已进入深水区,力度不减,尺度不松,必须持续发力,纵深推进,让老百姓看到党中央反腐败的态度,决心和力度,体现当前反腐败重点整治领域的成果。

“数据还验证了党中央对当前反腐败的判断,即反腐败斗争虽然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庄德水说。

彭新林说,这些数据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反腐败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永远在路上。

“应当说,随着党中央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加之反腐败透明度提高,一定时期内落马的腐败分子数量增多是客观现象,这表明我们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同时,也恰恰说明我们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彭新林说。

主动投案逐渐成为常态

2024年12月30日17点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云南省昆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毛建桥接受审查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毛建桥属于“主动投案”。毛建桥此前长期在云南省曲靖市工作,曾任曲靖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等职。记者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信息统计,自2024年1月5日江西省金融控股集团原总经理甘成武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开始,2024年全年总计通报约90名领导干部主动投案或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其中包括两名中管干部,2023年总计通报有60多名领导干部主动投案或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其中包括1名中管干部。

庄德水认为,越来越多腐败领导干部选择主动投案,说明随着反腐败工作向纵深推进,已经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也让违纪违法人员感受到这种强大的震慑力,不得不选择以主动投案的方式向组织交代问题。下一步,必须不断巩固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三不腐”,放大“不敢腐”的震慑效能,转化成“不想腐”的自觉。

彭新林说,主动投案人数大幅增加,表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叠加效应持续放大,反腐败标本兼治的综合效应更加凸显。主动投案者越来越多,正在逐渐从“现象”变为“常态”,这既是反腐败高压态势持续强化形成了强大震慑力所致,也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相关政策具有重大感召作用有关。

各层面各领域纵深推进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介绍,2024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金融、国企、医疗、体育等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的腐败,反腐败斗争向各层面、各领域纵深推进的态势非常显著,一大批腐败分子被查。

受访专家认为,上述领域专项整治的落地,体现了2024年反腐败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腐败上取得重大进展。

在庄德水看来,2024年的反腐败工作的重点领域与社会关注点、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直接相关,老百姓的痛点难点在哪里,社会呼吁最强烈的声音指向哪里,国家战略推进到哪里,哪里就是反腐败的重点。

受访专家认为,突出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力度不断加大,也是2024年反腐败工作的一个鲜明特点。

在宋伟看来,基层腐败治理成效始终关系到反腐败斗争全局,相关数据能够充分体现党中央对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高度重视,并且通过相关案件查办产生了强有力的震慑作用。一方面,基层“蝇贪蚁腐”多具有交织性,与扶贫惠民资金、社会保障、征地拆迁等多方面紧密相关,严重啃噬了群众利益,影响了党的执政根基;另一方面,基层腐败和不正当之风问题往往严重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基层的落实执行,从而影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正常运转。

彭新林举例说,2024年立案的现任或者曾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人数上升到7.7万人,充分表明坚持正风反腐向基层延伸,保持“惩”的高压态势,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取得显著成效。通过整治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促进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群众,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中央着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利于从根源上解决腐败发生问题,同时也让基层干部、基层民众享受到更多的反腐败红利,把反腐败成果转化成为改革的效能。”庄德水说。

在受访专家看来,反腐败工作还要更加注重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宋伟说,应更加注重从腐败产生的原因上深挖细作,从而揭示出更多规律性问题,基于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重点领域进行体制机制改革,以达到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的综合效果。

彭新林认为,应持续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惩治力度,把惩治行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进一步完善行贿犯罪规定;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强化行贿的联合惩戒等。

“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包括进一步健全完善惩治行贿的法律法规,推动案件查处与堵塞制度漏洞,强化监督管理相结合等。”彭新林说。

杭州余杭法院“十大行动”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祝继萍 庞楚楚

“激活商事共享法庭活力,推动涉企纠纷前端高效化解;一网通服务,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加强数字技术成果保护,让真创新受到真保护,让高质量受到严保护;灵活采用执行措施,推动涉企执行提质增效……”

2024年以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以“余法护企领跑十大行动2.0”为抓手,着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据了解,“十大行动2.0”的主要内容为商事共享法庭激活行动,涉企服务效能提升行动,商事解纷提档升级行动,知识产权协同保护行动,数字经济创新提质行动,涉企权益巩固攻坚行动,劳动争议专项化解行动,破立并举助企重生行动,个债清理保护创新行动,对企服务品牌

创建行动,涉及立、审、执、破各领域各环节。

去年4月,余杭某城市花园项目的200余户业主终于拿到了房产证,时隔18年,这个因失火导致项目资料灭失的历史遗留项目在破产程序中完成了竣工验收及办证。这也是余杭法院依托府院联动机制,成功试点“容缺登记”,有效破解破产企业瑕疵资产处置难题的生动实践。

据统计,近一年多来,余杭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108件,通过预重整、重整、和解等多元化方式挽救中小微企业8家,通过预重整制度帮助一数字经济企业获得“重生”并恢复经营,35天交出“债权人100%参会、重整计划100%赞成、普通债权100%清偿”的答卷。

余杭区数字经济产业集聚,随着新技术、新业态的蔚然发展,新型疑难复杂纠纷也不断出现。面对涉及新业态、新模式及新领域、

新类型的疑难复杂案件,余杭法院积极推进精品案例培育工程。

在“轻抖”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某科技公司设计、开发、运营针对抖音的“轻抖”产品,可以组织用户发布和完成“涨粉”“互关”“引流”等刷量任务,并在其中抽取佣金。

法院经审理后依法认定某公司通过以“盈利”为诱饵,诱导“接任务”用户伪装成正常用户完成刷量任务,其目的是满足“发任务”用户的刷量需求,干扰某短视频直播平台运营主体系统推荐算法,提升任务视频的曝光浏览量,其行为实质是人工制造虚假点击量和关注数量,干扰了平台流量分配机制,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最终判决某公司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承担赔偿责任。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就是服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余杭法院建立健全全区

级产销协同保护机制,协同区相关职能部门完善信息协查与共享、侵权预警与移送、关联推送、信用惩戒、司法确认赋能行政调解、知产三合一协同保护等协作职能,形成治理合力,提升知产协同保护效能。

与此同时,余杭法院积极推进商事解纷提档升级行动,聚焦高效化解商事纠纷,持续优化买卖合同纠纷集中审理执行机制,加大“凤凰买卖合同智审”应用推广力度。加强商事纠纷小额程序、简易程序适用力度,强化商事案件全流程精细化管理,实现商事纠纷质效稳步提升。

营商环境无止境。余杭法院院长王文柱表示,余杭法院将立足审判主业,用行动诠释法治力量,用担当书写营商画卷,坚持问需于企,问计于企,以更加高效、优质、便捷的司法服务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